

WENSHI ZHISHI

文史知识

笔谈

冯友兰

蔡尚思

张岱年

任继愈

略论儒学之特质

儒学与文学

「援西学入儒」的现代新儒学

儒学与佛教

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精神



陈俊民

方立天

方克立

董乃斌

朱伯崑

1988

6





文史知识

1988 年第 6 期

(总第 84 期)

儒学与传统文化专号

• 笔 谈 •

儒学发展的新阶段——道学	冯友兰	3
如何看待儒学的文化遗产	蔡尚思	5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张岱年	7
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	任继愈	10

• 历史百题 •

略论儒学之特质	朱伯崑	13
什么是儒学	余敦康	21

• 文学史百题 • 儒学与文学

董乃斌 28

{ 儒 学 源 流 }	以时兴衰的两汉经学	金春峰	35
	中国哲学认识史上的跃进——宋明理学	张立文	41
	宋明理学与近代新学之间的桥梁——明清实学	葛荣晋	48
	“援西学入儒”的现代新儒学	方克立	54

• 宗教与人生 • 儒学与佛教

方立天 59

{ 文化史 知识 }	说“儒”	马振铎	64
	中国古代的女子教育课本——《女四书》	张鸣岐	69

人物春秋	儒学独尊的奠基人——经学大师董仲舒	王生平	73
	绪绝学之传 立一定之规的理学大师朱熹	沈芝盈	77
	王阳明——追求自我与社会和谐的哲学家	陈宝良	82

• 儒学观念与制度 •

礼制和等级观念	刘志琴	86
儒家伦理思想新探	罗国杰	90
先秦两汉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洪廷彦	95

十三经的形成与经学类别	牟钟鉴	99
-------------	-----	----

• 中外文化交流与比较 •

儒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徐远和	105
中国儒学思想与西欧启蒙运动	何兆武	110
儒家伦理与新加坡精神	陈俊民	115

• 文史信息 •	礼对周代贵族情感的制约作用(53)	伊洛诸子的道德风貌(72)	古代伦理学家论“官吏廉洁”(94)	先秦诸子对孔子的主观化(109)
----------	-------------------	---------------	-------------------	------------------

• 文史古迹 • 古代文化的崇高殿堂——孔庙	凌 迅	121
------------------------	-----	-----

• 文史信箱 • 说说“二十四孝”	王炳照	125
-------------------	-----	-----

• 补白 • 则 • 尊师无向背(27)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34)
----------------------	--------------

山东曲阜孔庙(封四)

笔谈

- 冯友兰 儒学发展的新阶段——道学
- 蔡尚思 如何看待儒学的文化遗产
- 张岱年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 任继愈 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

冯友兰

儒学发展的新阶段——道学

先秦诸子时代结束以后，儒学的发展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汉代，由子学的一种上升为“独尊”的官学，但这时的儒学，严格地说，更接近于宗教，而不是纯粹的哲学。第二次是在宋代，儒家真正有了自己的纯粹的哲学，这就是道学。西方人往往称之为新儒家。

对于道学这个名称，有些人不以为然，认为应该称为理学。清代以来，道学和理学这两个名称一直可以互通通用，但是理学这个名称容易使人误以为是与心学对立的那个理学，况且其使用的年代也晚于道学，所以我赞成用道学这个名称。

道学之名源于韩愈的“道统”说。唐代中期，韩愈为了宣扬儒学，并抵制佛教和道教的日益扩大的影响，提出儒家有一个传自尧、舜、周、孔的“道统”，认为尽管儒、释、道三家都各有其道，但内容不同，儒家的道的内容是仁义。韩愈的这个说法在当时起了很大影响，但还不是一种新学说，因为他还是用“旧瓶”装“旧酒”，没有为儒家找到新的理论体系。

从唐代到宋代，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的一个大变化是门阀士族由地主阶级贵族降低为“四民之首”。贵族的地位是世代相承的，其经学思想也世代相传。而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要经过努力才能保住“四民之首”的地位。因而需要一种能使他们更深刻地认识社会和指导人生的哲学，于是道学就应运而生了。

就哲学史的发展说，在汉代经学思潮之后，玄学把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对立起来，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佛教的禅宗则把佛教的道与人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提出“担水砍柴，无非妙道”。这些说法对于解决人生的问题都有所贡献，但也都不够彻底。因为如果“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然”就失去了实在的意义，名教也会贬值。如果担水砍柴也是妙道，何以修道的人仍须出家？至此，中国哲学好似“山穷水尽疑无路”了。

针对这个情况，道学出来讲“仁者浑然与物同体”，把自然与社会统一在一起。照这种理解，仁就不只是社会中的一种道德了，它具有了超道德

超社会的意义。这样一来，名教也就是自然，人伦日用就都是妙道，人们可以在现实世界的生活中体验到一种宇宙的永恒。这是道学装进儒学这个“旧瓶”中的“新酒”，以此为哲学的发展打开了一个新局面，从此中国哲学就“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道学所讨论的主要是“人”的问题，例如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和任务，人和自然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性和人的幸福等，它的目的是使人生的各种矛盾得到统一。

一般地说，世界上有两种基本矛盾，一种是一般与特殊的矛盾，一种是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这两种矛盾是同一事实的后果，即每一个人或物都只是一个个体。人的特点是能自觉地认识到这个事实，所以是“万物之灵”。但人往往又不满足于这个事实，因为个体的人与社会和自然都形成了一定的关系，由这种关系他又会思考自然与社会对于自己有什么意义，以及自己对于自然和社会又有什么意义。这类思考的结果就是哲学，哲学就是关于“人”的学问。

照道学家的说法，一般与特殊之间，特殊不是一般的摹本，而是一般的实现。如果没有特殊，一般也就不存在了。道学所大讲特讲的理和性，即是就一般与特殊的关系讲的。一类事物的规定性就是这类事物的理，理在这类具体事物中的表现就是它们的性。人也是一类事物，当然也有其规定性。道学家继承孟轲的说法，把这

种规定性看作是“人之异于禽兽者”，这是人之理，这种理所表现出的人性必然是善的。不仅人性是善的，就是人的感性欲望其本身也不是恶的，恶者是随之而来的自私。有了自私，人的生活就不很合或很不合人之理。不过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有要求很合或完全合人之理的志愿，而实现的途径就是行道修德。从这个意义说，道学对于人生基本矛盾的解决，是从伦理的路子开始的。

道学家认为，人有道德行为，就意味着他在克服自私。道德行为的积累，意味着克服的增加。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私完全被克服了，量变成为质变，一般和特殊的统一就实现了。朱熹所说的“一旦豁然贯通焉”，大概就是这种质变。这时感性欲望并没有被废除，废除的只是自私。随着一般和特殊的统一而来的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道学家称之为“同天人”、“合内外”。达到了这种统一，人就进入了仁者的精神境界，在其中天地万物同为一体，全人类都是兄弟。用道学家的话说，这就是“穷理尽性”，也就是人性完全合于人之理了。

围绕着这些问题，道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前期道学从二程开始，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创立了道学，也分别创立了道学的两派，心学和理学。张载以“气”为本体，可以称为“气学”。朱熹以理、气并称，可以说是集大成者。这一时期的道学可称为宋道学。后期的道学可称为明道学。其中陆、王以

心学批判程颐、朱熹的理学，王夫之以气学为主，批判地吸收了理学和心学，对整个道学做了总结。他是后期道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全部道学的集大成者。

按传统的说法，明末清初有顾、王、黄三大儒，但认真分析起来，这三人的作用是不同的。顾炎武是一个学问家，不是哲学家。王夫之总结了道学，而道学是整个儒家哲学发展的

高峰，因而他也就总结了整个儒家哲学。就这个意义说，他是旧时代的总结。黄宗羲虽然也算是儒者，但他的批判锋芒已经直指作为儒学的根本的名教，他为新时代的来临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所以他是新时代的前驱。自此道学失去了活力，不再具备存在的合理性，而中国的社会也就拉开了近代的序幕。

(张跃整理)

蔡尚思

如何看待儒学的文化遗产

以孔子为祖师的儒家学派，在中国历史上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其思想影响之所及，连一些目不识丁的妇女童稚也在所不免。因此，如何看待儒学的文化遗产问题，不仅是专门研究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史学史、政治史、教育史等的专家学者的问题，也是文化人的共同问题，甚至可以说是全社会的问题。

为了正确对待儒学的文化遗产，我以为当前文化学术界应在下列四个问题上，进一步开展争鸣与探讨：

一、要把儒家学派放在整个中国文化遗产中进行估价。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历来一分为二，有比较优秀的和比较不优良的两种。古来许多儒生学人，一提中国文化遗产，就只讲以孔子、朱子为最大代表的一个儒家系统，而拼命加以宣扬，并认为谁批

评它谁就是民族虚无主义者。殊不知，在中国文化史上，除儒家一个系统外，还存在着另外一个系统。例如，墨子的反宗法比儒家的重宗法优良，墨子的反宿命比儒家的信天命优良，墨子的“作”重于“述”比孔子的“述而不作”优良，墨侠的施自贫贱始比儒家的“施自亲始”优良（关于这个问题，我另在《墨子思想体系》中详论之），墨子的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努力生产努力工作。比儒家的“天地之性人为贵”优良。如此等等。不知古来的尊孔反墨者为什么硬要颠倒是非呢？自孔墨以后，如司马迁作人物地位平等的全面史书，钟相的等贵贱均贫富说，李贽的反旧传统思想，黄宗羲的反君权思想，袁枚的情感哲学之类，无一不比孔子儒家学说为优良。不知那么多的旧儒家新儒家为什么熟视无睹呢？我以为，

不把儒学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历史中加以考察和比较，而一味尊孔崇儒，排斥其他较优良的学派，那才是莫大的民族虚无主义。

二、要认清儒学被尊与盛行于什么时代，其原因何在。例如：为什么汉高祖在野时要反儒，而到了在朝时就尊儒？为什么汉武帝以后的王朝，一直都在尊孔而不反孔？为什么元明清各朝代的科举教育都推行尊孔读经？为什么梁启超、章太炎等国学大师在清末不得志时就反儒反孔，而入民国较为得志时就尊儒尊孔？为什么民国时代的封建军阀仍然要尊孔，甚至下令读经？为什么民国前十年间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要打倒孔家店？我以为，如果有意无意地回避这些重大问题，那么就不可能正确估价儒家学派在中国文化遗产中的地位。因此，文化界尤其是某些对儒家孔子很有感情者，有必要科学地思考和解答这类难以回避的问题。

三、正视儒学研究的现状，正确给予引导。现代国内研究孔子儒学的，就其主要方面说，可以概括为两派：一是崇拜的，一是批评的。持崇拜态度的一派，现代与近代有所差异。近代有明目张胆的尊孔团体如孔教会、孔教大学等。有些宣传孔学的著作，既把孔子资产阶级化，又以孔学进行反共活动。现代就只有变相的尊孔而不再有公开的尊孔了，只有讲孔学可以与无产阶级相结合而不再讲孔学可以与资产阶级相结合了。持批评态度

的一派，也有现代与近代的区别。旧中国时代，从清末到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尊孔反孔的激烈斗争，而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最高潮。反对孔子儒家的斗争，这在当时是很必要的，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现在某些人完全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是非历史主义的。有位教授就鲁迅说的“礼教吃人”一语，驳斥道：“礼教怎会吃人？”但是，对于孔子说的“苛政猛于虎”，却不敢驳斥为“苛政怎么吃人”。这是不足以服人的。我敢断言，对孔学研究的分歧，不论变换什么方式，都将长期继续下去。有尊孔，就有反孔。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许一派讲话，不许另一派申辩，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现实的。孔学问题和其他任何学术问题一样，只有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才有可能逐步接近真理的彼岸。

四、儒学不可能替代马克思主义，充当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对于现代中国的国情，从历史角度来考察，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建立在延续了二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古代中国和近百多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近代中国的基础之上的，必然会有封建主义的影响与资本主义买办化的影响。因此，出现了某些人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某些人以洋人的是非为是非，而另一些人则二者兼而有之的现象。第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诞生于二十世纪，它同全世界各种族、

各国，各社会息息相关。要再像清末与“文化大革命”以前那样闭关自守，是绝对不可能的，也是有害无益的。在这样的形势下，以为儒学可以像二千多年那样对中国社会发生作用，成为“万世师表”；或以为西洋各大国是以儒学致富强的，中国也可以来个“孔马”相结合，那就大错特错了。资本主义的民主与科学，优于封建主义的反民主反科学；社会主义又优于资本主义，并将更加发展民主与科学。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不能以外国人宣传孔子儒家的是非为是非，也不能以中国历史上宣传孔子儒家的是非为是非。对孔子儒家应当一分为二，再也不应当作片面宣传。应

当批判继承的部分，就予以肯定，却不必大事宣扬。应当批判而不应继承的部分，就断然同它决绝，亦大可不必要留恋不舍。特别是封建宗法血统观念、礼教等级观念等在政治上、风俗上以及其他方面的种种表现，尤须大力加以批判和破除。

儒学是新不起来的。新来新去，仍然在旧儒学的范围内做文章，不会有什么“新”的创造。若把儒学加以资产阶级化或无产阶级化，不仅难免穿凿附会，而且根本就不是儒学了。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儒学不是最优良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我的认识。

1988年3月6日于复旦大学

张岱年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战国时代，儒墨并称“显学”，实际上儒家的影响较墨家为大。《庄子》书中以“寓言”、“重言”的形式表述思想，所谓“重言”是借重名人来立言。庄子所借重的名人主要是孔子和老子，却未尝借重墨子，足见孔子的声望在当时超过墨子。秦始皇运用法家的学说统一天下，焚书坑儒，使儒学受到一次严重的打击，但秦朝“二世而亡”。汉初尊崇黄老之学，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

是儒学正式居于统治地位。魏晋时代玄学盛行，虽然嵇康公开倡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但多数玄学家仍尊崇孔子为最高的圣人。隋唐时代，佛学昌盛，儒、释、道三教并尊，但政治法度仍是儒家的一套。宋代理学兴起，恢复了儒学的权威地位，历宋、元、明、清，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尊崇。直到五四运动，儒学受到严厉的批判，儒学在思想意识上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宣告结束，儒学独尊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但儒学在传统文化中占有的主导地位，还是应该承认的历史

事实。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中国历史的新时代，我们要努力建设中国的新文化。在建设新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对于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的过程中，首先要对于儒学进行分析、批判。中国文化本来居于世界的前列，从16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中国落后的原因很复杂，作为主导思想的儒家学说没有能够起促进中华民族迅速发展的作用，暴露了儒学的严重缺陷。事实证明，儒学的内容距离近代世界的要求相去太远了。

但是，儒学在历史上的作用应如何评价呢？这也就牵涉到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应如何评价的问题。在近代，中国与西欧相比，确实是落后了；在古代，中国与西欧相比，应如何看待呢？近来出现一种全盘否定传统的思潮，认为“在中国对人的设计的传统中，缺乏人格的概念”，“在民族传统中个人的人格概念并未建立起来”，这无异于说中华民族的历史不是“人”的历史，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本算不得文化。这个问题关涉到民族的价值和尊严，不可以不辨！究竟是中国传统中缺乏个人的人格概念呢？还是你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缺乏正确理解呢？

中国传统中“人”的观念的问题可以说是关于儒家学说的本质的问题。儒家学说是肯定人的价值的，还是否定人的价值的？是要求提高人的自觉的，还是压抑人的自觉的？我认为，

儒家基本上是肯定人的价值，要求提高人的自觉的。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人格这个名词，但有“为人”、“人品”等名词，其意义与人格相同。所谓人的价值，包括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优越性及个人的自我价值。儒家肯定人具有高于一般动物的价值，同时也肯定个人在社会中的自我价值。以孔孟为例，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显然把人与鸟兽区别开来。孔子宣称“古之学者为己”，认为学问是为了提高自己，显然肯定了自我的重要性。但孔子也重视别人，他所鼓吹的“仁”的涵义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既肯定自己，也承认别人，人己兼顾，由己推人。承认别人，就会降低自己吗？孟子宣称“人人有贵于己者”，他称之为“良贵”，所谓良贵即人人固有的内在价值，也可称为天赋价值，这更是肯定了人类的价值和个人的价值。孟子宣扬“自任以天下之重”，可以说是对于个人的肯定。梁漱溟先生论中西文化，说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我认为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儒家的学说确实不是主张自我中心，而是主张从自我出发，由己推人。这种由己推人，可以说是人我并重，人我兼顾，这有什么错误呢？德国哲学家康德宣称应以人人为目的，不要把别人当作工具，也是主张人我并重。我们不能因为儒家不讲自我中心就认为儒家否认了个人的价值。

这里关涉到儒学与专制主义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曾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1页）专制的君主确实是轻视其臣民的。儒家是肯定君权的，儒家是否因此也就“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呢？我认为，还不能把儒家学说与君主政体等同起来。孔子虽然把“君臣之义”当作“人之大伦”，但认为君主如果要求“言莫予违”就有“一言丧邦”的危险，这就是明显地反对个人独裁；孟子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君臣关系看作相对的关系。孟子这“民贵君轻”之说，宋代理学家也是同意的。朱熹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陆九渊说：“自周衰以来，人主之职分不明。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却知人主职分。”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儒学受到专制君主的尊崇，事实上专制帝王与儒家学说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距离的。我认为，从汉魏以来，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士权和王权的斗争。一部分士大夫提倡“以天下为己任”，企图移风易俗、整饬朝政，因而受到当时统治集团的迫害。最突出的事例如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明代末年的魏阉之乱，充分表现了士权与王权的激烈斗争。士权也不是代表劳动人民的，但不当权的士大夫反对当权派的斗争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儒家学说，虽然不主张“个人本位”，但也肯定个人的人格价值；虽然不主张“自我中心”，但也肯定自我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孔子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这就是承认人人都具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在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越来越严酷，明清时期，专制君权日益加强，扼杀了自由思想的生机，但是不应把专制君权的罪过都归咎于儒学。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惨重的灾难。有人探求“十年动乱”的原因，于是归咎于封建思想的流毒，归咎于儒学的影响，事实上儒学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受批判的对象。而且在漫长的封建时代，虽发生过多次动乱，但还没有出现过像十年动乱时期那样残酷迫害知识分子的情况，如何能简单地引古论今呢？当然，封建流毒是应该彻底肃清的。

儒学的内容与近代世界的要求有较大的距离，但是在历史上儒学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以及世界文化的发展曾起过较大的积极作用，法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对于中国儒学表示钦佩，并不是偶然的。我认为，儒家学说标志着“人的自觉”的长期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儒家的理想主义可以与西方古代的理想主义媲美。我们在批判儒学的同时应对于儒学有较深的理解。

儒学的严重缺点是没有肯定“思想自由”的必要，没有强调对于自然

界的研究。因此，儒学内部缺少走向近代文明的充足契机。矫正儒学的偏失，建立社会主义文化的新传统，现

在已经到了关键的时期。

1988年3月10日

任继愈

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

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前已有以儒为职业的，但他们还不成为学派。孔子一生从事教育事业，开门授徒，以他的思想体系教人，于是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学派——儒家。孔子和儒家有不可分割关系，是大家公认的。后来宋朝兴起了儒教，儒教奉孔子为教主，教主出现在孔子死后若干年，孔子对此不负任何责任。儒家与儒教不是一回事。

北周时已有“三教”的说法（三教指佛教、儒教、道教），北周国祚短促，没有引起注意。隋唐时期“三教”之说已很流行，唐朝凡遇国家庆典，诏“三教”辩论于殿廷。儒、释、道三教为自己的“教”争荣誉，争地位，都推派代表积极参加。

唐朝不少排斥佛教、道教之人，最为人所知的有韩愈。韩愈排斥佛教（也反对道教），韩愈排佛教，在于用儒教代替佛教和道教，为儒教争地位。象韩愈这种主张的人，唐朝占少数，社会上多数人承认三教鼎立这样的事实，认为孔子、释迦、老子都是“圣人”，都值得尊敬^①，释迦的身份从南北朝起，人们已不把它当作外国

人看待，佛教经典也取得与儒家经典同样合法的地位，建立了“佛教经学”，普及程度超过了儒家经典。

儒教成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这不是什么名词之争，它实在关系重大。为了说明事实，先从中国的国情说起。

唐虞三代的历史资料留下来的不多，我们只从秦汉说起，秦汉奠定了后来二千多年的政治格局，即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秦汉以后的许多朝代，直到清末，都是沿着这条路线向前走的。二千多年来也有分裂的时候，不过为期不长，即使分裂期间，从人民到统治者都认为是不正常的现象，统一才是正常的。二千年多年贯穿着一对基本矛盾：政治上的高度统一，经济上的极端分散。封建经济是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自然经济，产品为了自己消费，不为流通。经济交流、手工业品基本上是封闭

① 三教鼎立，孔子、老子已被看作教主，地位与先秦的孔子不一样了。

的，只有供上层贵族享用的奢侈品带有全国性的流通，南海的珍珠、丝绸，北方的毛皮都集中到宫廷贵族手中，丝绸之路还远达欧洲。但这也限于奢侈品，不能与后来资本主义时期的商品相提并论。

自然经济的特点是封闭型，分散经营，不希望政府过多的干预。中国秦汉以后是统一的大国，从政治上要求集中权力，多民族，地区广大，如果政令不一，就难以达到统一的目的。中国中原地区进入封建社会比较早，生产也比较发达，周围的地区有些民族还处在奴隶制甚至原始社会，双方难免发生掠夺性战争。为了保证国家的生产正常进行，客观也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维持安全繁荣的局面。政治上的高度统一，是客观需要，经济上的极端分散又是客观现实，它是自然经济的本性。政治的集中与经济的分散，这一对矛盾如何协调，不使它畸轻畸重，便成了历代统治者关心的大问题。儒教在这里起着重要作用。

封建社会靠什么统治？像中国这样纵横数千里、上万里的大国，光靠武力、政治的权力是办不到的。除了政治军事力量以外还得有宗教来配合。世界的三大宗教都是在封建社会发展起来的，这不是偶然现象。封建社会需要宗教。如果仅仅是个人的需要，它带有主观因素和偶然性，可以不必太注意，如果出自社会的需要、国家的需要，这就不能看作主观的、

偶然的，它具有社会性、群众性、客观性。宗教的产生和流行，即出于社会客观的需要。儒教就是出现在中国古代这块土地上的特殊宗教，只有中国才能有的宗教。

宗教之所以为宗教，有它的本质部分和外壳部分。外壳部分，是它的组织形式、信奉的对象、诵读的经典、宗教活动的仪式，等等。这些方面，因教而异，各不相同。宗教之所以为宗教，还有它的本质部分，本质指它所信仰、追求的领域是人与神的关系或交涉。用中国古人习惯的说法即“天人关系”。宗教涉及的范围既在社会生活之内，又在社会生活之外。宗教要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吉凶祸福问题，同时又要借助超实现的外在力量。“天人关系”涉及两个对象，“天”和“人”，两者之中，有一头是虚设的——天；有一头是实在的——人。这必然造成它的虚构性与实践两者的奇特的联系。

有没有一个创造世界的主宰者，创造世界的主宰者是什么形象，是慈祥还是严厉，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有形还是无形^①，这都不重要。宗教与哲学都讲人生和社会的根本问题，但两者的立场和方法不同。哲学用理性、思辨的方式，去探索，分析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宗教以信仰和直观来探索、解决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

① 佛教，基督教有圣像供奉；伊斯兰教无圣像，道教不承认有造物主。

题。哲学至少承认有些问题还搞不清楚，不便贸然下结论，宗教不承认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也没有搞不清楚的问题，人生中遇到的一切疑难大症，宗教都能手到病除。由于有这样的差别，哲学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以后^①，与科学的关系较密切；宗教从本质上与科学对立，因为信仰主义不允许怀疑，崇拜的对象决不允许当作研究的对象，走的是一条非理性主义的道路。也有的宗教哲学用理性主义的形式把人引向信仰主义，佛教中某些流派就是用思辨为手段，把人引向信仰主义的。理学，我叫它做儒教的，就是这样的一种以理性主义为手段，最终把人引向信仰主义的。宋儒教人读书要善于怀疑，朱熹关于读书法讲了很多有价值的经验。但不允许怀疑人为什么要孝，为什么要忠。对忠孝发生怀疑，等于禽兽。王阳明算是最大胆的反传统的怀疑者，敢于对孔子的话进行考虑后才相信，不盲从。但王阳明也不敢怀疑，人是否要忠，要孝。认为忠孝是天性，是良知所赖以发生的根荄。

宗教提倡禁欲主义，并有一系列遏制欲念的训练方法，儒教也是这样，“征忿、窒欲”是儒教修养的一项基本内容。哲学教人服从真理，为真理而斗争，朱熹遇到小人当道，对他进行压迫时，他没坚持斗争，把上奏皇帝进行申辩的稿子销毁，自称“遁翁”，这是他占卜以后受到神明的启示以后做出的决定^②。主宰命运的是

“天”，不是“人”。对待“天人之际”，最后屈人以顺天。

儒教除了具有宗教的一般本质以外，儒的外壳，也有宗教的特征。它信奉“天地君亲师”。君亲是封建宗法制度的核心；《四书》、《五经》、《十三经》是儒教共同诵读的经典；祭天，祭孔，祭祖，是封建宗法制下，自天子到老百姓按等级制度举行的儒教祭祀仪式。童蒙入学塾读书，开始接受儒教的教育时，对孔子牌位行跪拜礼^③。从中央到地方各州府县都建立孔庙，为孔教信徒定期聚会朝拜的场所。正因为它是一种中国自己培养起来的宗教，它以封建宗法制为核心，吸收了佛教、道教中的一些宗教修养方法（如禁欲主义、静坐反省）它千百年来，培养、锻炼出了大批愚忠、愚孝的典型，载入典册，铭于金石、祀于廊庙。儒教有时以反宗教的面貌出现，实际上用适合封建宗法制的民族形式的宗教，以更加入世的姿态把人们引入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偶像崇

① 在欧洲是近代以后的事，中世纪时期，哲学在宗教的包容下才能存在。

② 朱熹《周易本义》开头讲占卜仪式，说：日炷致敬，……筮者斋洁衣冠北面，盥手焚香，致敬。……命之曰：假尔泰，筮有常，假尔泰，筮有常，某官姓名，今以某事云云，未知可否，爰质所疑于神于灵，吉凶得失悔吝忧虞，惟尔有神，尚明告之。……

③ 鲁迅记述他幼年入学，在三味书屋拜师礼，还未改。

略论儒学之特质

• 历史百题 •

朱伯崑

儒学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就是说，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或学术形态，是不断演变和发展的。先秦时期的儒学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到了汉代，儒学成了经学的支柱。魏晋时期的儒学则受了玄学的影响。宋明时期的儒学，主因经以识义理，被称为宋学。清代儒学在发展过程中，又演变为汉学，但又不同于汉代的经学。近代的儒学，因受西学的影响，也有自己的特点。纵观两千多年的学术史，从来就没有一成不变的儒学。每一时期的儒学，又分化为许多流派，相互争论。历史上也没有铁板一块的儒学。但儒学作为中国学术史上一大流派，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又有其自身的规定性，有其不变的一面，否则，便不成为儒学了。我们不能依儒学中某一流派的思想谈儒学的特点，也不能脱离与其对立的学派谈儒学的特质。

任何学派的形成都有其社会根源。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经济和封建制度是儒学发生和发展的温床。儒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同封建社会共存亡。但它作为一种学术形态，虽流行于封建时代，其关于自然和人生的理解、理论思维的阐发以及治学的方法和经验等，却培育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在人类文明史上独树一帜，并对人类文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和传统是不容也不能割断的。一个民族只有善于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抛弃其中陈腐的东西，发扬

拜的死胡同。

儒教建立后，历代政府用行政命令推行它的主张，用科举考试鼓励青年人钻研诵习，耳濡目染，使宗教社会化，把俗人变成僧侣。人们记忆犹

新的十年动乱期间的造神运动所以得逞，千百万群众如醉如狂的心态，它的宗教根源不是佛教、不是道教、而是中国儒教的幽灵在游荡，只不过它是以无神论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

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不是依傍别人，而是在吸收其它民族优秀文化的同时，创造和更新自己的民族文化，方能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受到人类的尊重。研讨儒学的特质，对于我们今天建设新的精神文明，并非是多余的事。以下，就儒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谈谈其特质及其价值。

—

就中国学术思想的传统说，儒学不同于其它流派的一大特点，是解释和阐发其所尊奉的典籍即《五经》和《四书》。这些经书涉及到哲学、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历史等各方面。任何时代的儒家学者，都以此为其研究的中心课题，从而构成了儒学的基本内容。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汉朝以来，通称为“儒生”，即是说，受过儒家的教育，特别是知识文化方面的教育。但儒生并非就是儒家学者，这是首先应该说明的。

儒学以解释其尊奉的经书为任务，始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孔子在鲁国办教育，以讲解西周以来的典籍《书》、《诗》、《礼》、《乐》、《易》为宗旨，晚年又编修鲁国历史《春秋》，从而为儒学奠定了基础。战国时期的儒学大师孟子和荀子，都是以阐发经书和孔子学说为己任的。他们对经书的解释，成为汉代经学的来源之一。历代著名的儒学家，无一不是以阐发儒家的经书为宗旨，以解释经书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魏晋时期的玄学家何晏著《论语集解》，王弼著《周易注》，虽然其中渗入老庄观点，亦是阐发儒家经典，属于儒学范围。清代的汉学家，其所从事的文字训诂和考证工作，也是以儒家的经典为主。近代著名的儒学家康有为，其所著《礼运注》、《论语注》、《中庸注》、《孟子微》、《春秋董氏学》等，更是借注解儒家典籍，发挥其新义。总之，一部儒学史，也可以说是一部经学史。离开儒家的经学而谈儒学，儒学便成了无源之水。当然，有些儒家学者，虽无关于儒家典籍的注解，但其著述的内容，是阐述儒家的教义，亦属于儒学范围。

儒学的共同点是阐发儒家的经义，但由于其对经义的理解不同，又分化为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流派。如先秦儒学分为八派，而影响最大的是孟荀两派。汉代的经学分为古今文两派，学术倾向也不尽同。宋

明时期的儒学，被近人称为新儒家，更是分化为许多流派，彼此长期争论不休。到了清代，儒学内部又展开了汉宋之争。学派的分化同当时的社会政治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但无论那一派的观点，都出于对儒家经书的解释或发挥。其解说，即使不符合经书的原意，并不影响其为儒学传统。任何学术思想的发展，都要以其前辈提供的思想资料为前提，此是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之一，儒学也不能例外。至于儒学从汉代开始，被封建王朝尊为经学后，奉《五经》和《四书》为金科玉律，不可非议，儒家学者只有通过笺注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这又是封建时代经学的一大特征。此种尊孔读经的传统，具有厚古薄今的倾向，又对人们的思想起了禁锢作用。到了近代，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不能不受到进步思想家的批判。

二

封建时代的学术传统，具有鲜明的宗派性，总以自家一派为正统，或以自己所信奉的一派为儒学的真面貌。欲探讨儒学的思想特征，必须摆脱传统的门户之见，特别是道学家的偏见。我们也不能以先秦孔孟言论为尺度，衡量儒学各派思想，孔孟只是儒学的开拓者，后来的儒家著述，无论就其深度和广度说，都大大超过了孔孟学说。因此，探讨儒学的思想特质，又不能限于孔孟。

一个学派的思想特质，还要表现在同其它学派的区别上。就儒学说，它既不同于先秦的墨家、道家和法家，也不同于汉代以后佛道两家。它们不仅宗旨不同，而且长期辩论不已。特别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东晋南北朝以来，思想界形成了儒、释、道三大系统，又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体。封建时代的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其思想特质又突出地表现在同佛道两大系统的对比中。就此而言，儒学的思想特质，可以概括为现实主义，即肯定自然和社会，对实在世界不采取回避的态度，特别是对人类现实生活采取积极的立场，其论宇宙和人生，其谈理想，其思维方式以及治学方法，都是以此为中心而展开的。而佛道两家思想的特质，可以称之为避世主义，或者屈服于自然，或者幻想超越自然，而对人生都采取消极的甚至于

否定的立场，从而追求一种自我解脱的精神境界或彼岸世界。我们就以此为线索，来看儒学思想特质的具体表现：

(1)厚生人，黜彼岸。儒学总是关心或重视人间即生人的生活，而不追求或向往死后或来世的幸福。此种现实主义人生观，始于孔子。如关于鬼神，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认为应致力于生人之事，不必追问死后的事情。此种思想，到孟子，提出修身立命说，到荀子发展为无神论，认为祭天和祀祖只是教化百姓和文饰人类生活的一种方式，并无神秘的意义，所谓“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荀子·天论》）进而否定了命定论。宋明清时期的儒学家，都批评了道教的神仙说和佛教的来世说以及无生说，从欧阳修到戴震都以反二氏的宗教神学为自己的任务。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孔子所讲的“知天命”，是一种命定论，却排除了以天为神的福善祸淫说；汉代董仲舒倡导神权论，是将天象人格化，用来警戒君主和臣民维护王朝的整体利益，具有神道设教的意味，也不是要人们追求死后的世界或灵魂不解脱；陆王心学，虽然受了佛教禅宗的影响，同样以追求彼岸世界为违背人道；近代儒学家康有为，继承今文经学派尊孔论的传统，奉孔子为“大地教主”（《孔子改制考序》），企图建立孔教。但其所谓孔教，无非是借孔子的幽灵来宣传近代的民主意识，同样不是要人们死后到天国去享受永恒的快乐。总之，儒学不以彼岸世界为归宿，而以治理好人的现实生活为目标。如果说，宗教的本质是幻想于彼岸世界中求得解脱，那末，儒学并非宗教。

(2)明伦理，主自律。无论那一派儒学都提倡伦理教化和道德修养，以此来调整人际关系，并以圣人为人格的最高标准。儒家所推崇的圣人，是指道德境界最高尚的人。孔、孟、荀都以此自勉，并教育其学生。儒家学者，又都是伦理学家，其著述皆谈道德问题。在儒家看来，道德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就维持生产和生活说，道德贵于刑罚或法律的制裁，“德教行而民康乐”，“法令极而民哀戚”（《大戴礼记·礼察》）。这两条，为后来儒家学者所发扬。封建时代的儒学所推崇的德